

# 孔德社会学思想的体系构建与历史影响

肖倩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7日

## 摘要

作为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与社会学学科奠基人, 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法国社会秩序动荡与工业文明兴起的背景下, 提出了一套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为核心的系统学说。本文从实证哲学的方法论根基、社会静力学与动力学的结构分析、社会科学化路径的内在悖论三个层面, 系统阐述孔德社会学思想的全貌, 并着重揭示其决定论倾向、乌托邦色彩与欧洲中心论的内在限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孔德的理论框架延伸至当代数字社会语境, 从人工智能的治理困境、网络共同体的整合失效、“秩序与进步”的价值撕裂等议题出发, 重估其实证精神与有机体论在当代的效力与局限。孔德的真正遗产并非一套具体的操作程序, 而是一种将社会视为可获理性理解之整体、并持续追问其整合何以可能的理论态度——这一态度在后实证主义转向、风险社会理论与数字治理的当代讨论中, 依然构成一条不可忽视的思想线索。

## 关键词

孔德, 实证主义, 社会静力学, 社会动力学, 数字社会, 秩序与进步

#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Auguste Comte's Sociological Thought

Qian Xiao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4,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positivist philosophy and the founding figure of sociology as a discipline, Auguste Comt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upheaval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proposed a systematic doctrine centered on the study of society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whole picture of Comte's sociological thought from three levels: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positivist philosophy,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statics and social dynamics, and the internal paradoxes of the path toward a science of society. It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his thought, including its deterministic tendencies, utopian elements, and Eurocentrism.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extends Comt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digital society, reassessing the validity and limits of his positivist spirit and organicism in the present era by addressing issues such as the governance dilemma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failure of integration within online communiti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value of "order and progress". Comte's true legacy is not a set of concret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but rather a theoretical attitude that regards society as an intelligible whole and continuously asks how its integration is possible. This attitude remains an indispensable intellectual thread in post-positivist turns, risk society theories, and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f digital governance.

## Keywords

Auguste Comte, Positivism, Social Statics, Social Dynamics, Digital Society, Order and Progres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导论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的名字,与社会学的学科独立紧紧连在一起。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漫长余震中,旧制度已然崩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成形。产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飞跃,也制造出新的阶级裂痕;启蒙运动推倒神学的权威,却未能及时提供一种被广泛共享的意义框架。孔德正是在这种“失范”的深处,提出了一个极具雄心的问题:能否像研究自然界那样研究人类社会,从而为秩序的重建找到科学的基础?

这一问题至今仍在震荡。孔德提出“实证科学地认识社会”的方案,不仅确立了早期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且以其“秩序与进步”的双重命题,为工业社会的演化提供了一种富含哲学意味的诊断。然而,孔德的体系远非一套严密无伤的理论机器。理解他的思想贡献,也必须审视其内在的反讽:一个立志用科学取代神学的思想家,晚年却创立了以人类为崇拜对象的“人道教”。科学从解释世界的工具,蜕变成了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类宗教。

本文从四个维度展开论述。首先,从实证哲学的方法论根基入手,探析科学分类体系与三阶段法则的理论预设。其次,将目光转向社会静力学与动力学,分析孔德借以建构秩序与变迁的整体架构。进而,讨论其实证方法的内在悖论与历史批判,揭示其体系的理论缝隙。最后,将这一讨论引向当代:当数字技术全面重构社会关系、算法成为新的治理力量时,孔德所开创的实证精神与理论取向,还能为理解今日社会提供何种启示?这是全文的归结点。

## 2. 实证主义哲学:社会学的方法论根基

### (一) 科学分类体系的重构

孔德实证哲学的起点,是圣西门所留下的一张有待完善的科学分类草图。圣西门已经注意到,各门

科学并非并排摊放的知识板块，而是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次序。孔德将这一直观扩展为一套六层级金字塔：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这种排列并非任意的罗列，而是有严格的认识论依据：越是底层的学科，研究对象越简单、可量化程度越高、普遍性越强；越是上层的学科，对象越复杂、个体性越突出、对整合能力的要求越高[1]。

将社会学置于科学金字塔的顶端，意味着孔德赋予这门新科学一种特殊的整合性地位。他的理由很清楚：社会现象包含了此前所有物质现象与生物现象的属性，同时又涌现出集体意识、制度、语言等不可简单还原到生理学层次的新属性。因此，社会学不能归结为生物学的一章，它需要属于自己的概念工具与研究方法，但同时又必须以前五门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因为它所研究的是在最复杂层次上发生的现象秩序——这正是孔德所说的“科学阶梯”的要义[2]。

这一分类逻辑所隐含的认识论预设相当深刻。其一，它预设了知识的统一性是可能的：所有科学在方法论上可以连续过渡，而社会学正是这一过渡的完成者。其二，它预设了社会世界的可知性：无论社会现象如何复杂、多变，在原则上都具有可以被实证方法把握的规律。这两个预设构成了孔德全部体系的哲学骨架。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孔德的体系已经埋下了争议的种子：将自然科学的认知逻辑如此平滑地移用于历史性、意义性极浓的社会世界，是否从一开始就低估了社会研究的诠释性维度？这个问题在后来的韦伯、舒茨等反实证主义传统中被反复提出，至今仍是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议题。

孔德为其“实证”概念赋予的六种含义——现实性、有用性、确实性、正确性、建设性、相对性——集中体现了他对知识的标准想象。区分“为什么”与“怎么样”是其中的关键：科学不追问现象背后的终极本质或第一因，只描述现象之间恒常的共存关系与相继关系。这与经验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但在当时仍有激进的锋芒。对孔德而言，纠缠“宇宙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智力资源的浪费，而把资源集中到可以验证、可以利用的现象关系上，才是理智成熟的表现。其名言“为预见而求知”(Savoir pour prévoir)，简洁地表述了这种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3]。

## (二) 实证精神的深层结构

实证精神可以从三个相互支撑的维度来把握。

所谓“可知性”，并非宣称人类已经掌握一切规律，而是一种原则上的不可知论：那些永远无法纳入经验观察的绝对本质，不构成知识的合法对象。天文学在这里成为孔德最理想的示范：天文学家描述行星运行的规律，不再追问造物主为何如此安排。把这种姿态移植到社会研究中，就是要用规律的描述取代意志的追问。然而，孔德的“可知性”所预设的那种赤裸裸的现象自身，在后实证主义视角下早已被解构。观察总是负载着理论，没有完全“中立的”经验事实。这一点对孔德方法论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系统性”意味着社会不是孤立事实的堆积，而是结构性的整体。局部现象必须放回它们在社会整体中的位置去理解。这正是社会静力学的基本立场。孔德把这一整体性原则推到了很高地位，甚至声称“了解整体，才可能真正了解部分”。社会有机体的比喻在此得以扩展：正如不能把心、肺从生物体中剥离出来孤立地研究其功能，也不能脱离社会结构去研究家庭、分工、宗教等局部现象[4]。这一思想在后来的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传统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社会学应借鉴物理学分类法，分为社会静力学(结构研究)和社会动力学(发展规律)。实践意义：主张以实际效用为标准，仅关注“如何”而非“为何”，避免脱离实际的思辨。

“实用性”是孔德实证精神的归宿。科学知识不应是学院中的雅玩，而是参与社会改良、重建道德秩序的力量。知识的功能在于预见，预见的目的是指导行动。这使孔德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强烈的伦理与实践驱动，而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预设。在这一点上，孔德与马克思共享了对“解释世界”的不

满足——二人都要求改变世界，只是在路径的选择上分道扬镳。

需要指出的是，孔德对“实证”一词的六种界定(现实性、有用性、确实性、正确性、建设性、相对性)在 19 世纪上半叶具有鲜明的论战意义。彼时，复辟时期的法国思想界仍被各种形而上学体系与神学论证所主导，孔德的实证纲领旨在将知识讨论从“终极原因”的纠缠中解放出来，聚焦于可观察、可验证的现象关系。这一转向在当时是激进且富有成效的，它直接推动了社会科学从哲学母体中的独立。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是 20 世纪中叶以后对“观察负载理论”“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讨论，孔德所预设的那种纯粹中立的经验立场已被普遍视为一种过于简化的科学观。这并不意味着孔德的“实证精神”彻底失效，而是提示我们：任何知识纲领都需要在其历史条件中被理解，同时也要接受后来批判的检验。当代社会科学在经验研究上的高度精致化，恰恰是在吸收孔德对“可验证性”的强调的同时，超越了其朴素的经验主义。

### (三) 三阶段法则理论预设

三阶段法则最集中地表现了孔德的线性进步观。神学阶段，人类用拟人化的意志解释自然；形而上学阶段，用抽象本质取代人格神；实证阶段，用现象之间的恒常关系取代本质。在孔德看来，个人的智力成长大致复演了人类整体的认知进化：孩童的迷信，少年的思辨，成年的求实。

然而，批评这种线性叙事并不难。马克思从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的演进角度提出了与三阶段法则不同的历史分期，他的批评要点在于：孔德把历史运动的动力过分集中在智力与观念的层面，忽略了物质生产与经济结构的根本作用。这一批评触及了孔德体系的一个结构性缺陷——他对经济基础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缺乏充分分析，使得他的进步叙事更像一部以知识演进为主线的历史描述，而不是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

但也不能因此将三阶段法则视为毫无意义的虚构。它在对知识合法化方式的长期变迁所做的宏观素描中，确实捕捉到了一个重要趋势——伴随现代科学兴起，关于社会的知识如何逐步摆脱宗教与形而上学的论证方式，转而追求经验的可验证性。这一点，即使在后实证主义时代，依然具有历史认识的价值。

## 3. 社会静力学与动力学

### (一) 社会静力学：结构、整合与有机体论

社会静力学致力于回答现代社会何以维持其统一性的问题。

孔德的起点是对家庭的独特设定。他并不把家庭只看作一种生活单位，而是看作社会联结的原始模型。在家庭内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情感上的依恋与依赖、代际之间的义务关系，构成了一种微观的“社会性”原型。家庭成员之间的结合，并非经由理性的社会契约，而是通过情感纽带——“爱”——完成的。孔德以此来对抗古典自由主义关于孤立的理性个体的预设：人首先生活在情感群体中，而后才进入按利益原则运转的更大的社会体系。因此，社会整合的秘密，不能完全从利益计算中去寻找，还必须诉诸情感与道德的力量[5]。

分工体系是孔德处理现代社会整合的另一着力点。他敏锐地看到，工业化产生的高度专门化的分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个人视野的窄化、社会团结的道德弱化——“道德失范”的雏形已经在这里出现。面对这种“专业化带来分散化”的风险，孔德没有像后来的自由主义者那样相信市场的自发协调，而是寄望于精神权威——首先是实证哲学，然后是他所勾勒的“人道教”——来重建一种跨越专业隔离的共同情感与价值认同。

宗教与语言，在孔德的分析中获得了极为突出的位置。宗教，不是作为一种神学信条，而是作为社会整合的情感机制被重新诠释。共同的仪式、信仰、象征，使个体超越孤立的自我意识，融入更大的集体表象。语言则是社会共同经验的历史沉淀物，是横跨时间与空间的集体记忆载体。借助宗教与语言，

社会才能实现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联结。在很大程度上，迪尔凯姆的集体表象理论正是从这种思路中获得灵感的。迪尔凯姆将孔德的社会整体论转化为可以经验研究的社会事实理论：社会事实对个体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社会如何经由集体情感结晶出道德理想，如何通过仪式将个体凝聚为道德共同体。这些都是孔德式的整体论社会观在实证社会学框架内的精致转化[6]。

孔德的社会有机体论提出“社会大于部分之和”，这并非一个琐碎的比喻，而是一种严格的方法论立场：社会自有其不可还原的属性，不是个体行动的简单加总。这种立场在当代网络科学中获得了新的形式。一个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互动网络，会产生出层级、聚类、涌现等整体特征，这些特征既不能从单个节点的性质中推演出来，又对节点行为产生结构性约束。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复杂网络研究所描述的系统涌现性，可以看作孔德的社会有机体论在数学模型加持下的现代表达。然而，二者的差异也不容忽视：孔德的有机体论带有目的论的烙印，他设想的“社会整体”是一个向着更高和更高整合状态进化的实体，而现代网络分析更倾向于关注结构生成机制，悬置目的论的宏大叙事。

## （二）社会动力学：智力演化与制度变迁

社会动力学探讨的是社会何以变迁的问题。在孔德的框架中，智力发展被赋予了驱动历史的首要地位。三阶段法则所描述的认知范型更替，在社会动力学中被展开为一种制度与文明的演化论。在孔德看来，神学阶段对应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形而上学阶段对应法律至上与批判精神的兴起，实证阶段则将导向工业秩序与道德信仰的重新整合。

道德进化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随着社会从军事形态向工业形态过渡，伦理系统也发生相应的转型：征服、荣誉、忠勇逐渐被劳动、合作、人道取代。这与后来滕尼斯的“共同体”到“社会”的演变、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转型，乃至马克思的封建伦理到资本主义伦理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同一时代的思想交响。

孔德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有序发展”的坚持。他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把希望压低在社会蓝图的激进重组之上，也不像保守主义者那样把秩序理解为固守旧制。他所理解的进步，是一种系统内的有序演进，拒绝革命式的断裂。这种改良主义立场，既反映出孔德早年与圣西门的交往经历，也折射出他对法国大革命反复震荡所感到的深层忧虑。如果革命是对秩序的彻底否定，那么实证社会学的使命就在于证明：社会进步可以不以暴力为代价，可以在维持有机整合的前提下完成结构性更新[7]。这一命题从未失去现实性——每一个面临改革的复杂社会，都必须处理改良、秩序与进步之间存在的深刻张力。

## 4. 方法论创新及其内在悖论

### （一）四大实证方法的再评估

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与历史法，构成孔德实证方法的核心。他对社会研究科学化路径的构想，在今天来看仍具有范式性的意义。

观察法坚持让研究立足于社会事实的搜集与描述，打破哲学史思辨的传统。实验法用于无法在受控条件下直接重复的社会时，孔德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实验”的思路——当社会发展出现某种病态时，正常的隐机制才得以暴露。这恰恰是现代政治学与比较社会学中利用自然实验进行因果推断的先声。

比较法在横向共时与纵向历时两个维度上展开，这与当代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纲领高度吻合。

历史法更是将一切社会事实置于时间序列中加以考察，拒绝把当下的状态当作不言自明的常数。孔德的这些方法论贡献，足以使他在社会学方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二）自然科学方法的移植及其限度

但是，孔德方法论的真正争议不在技术细节，而在其根深柢固的自然主义预设——是否可以将社会研究完全纳入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框架？

孔德并非没有意识到社会研究的特殊性。他承认研究者身兼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主客体同一性”，承认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层级远超自然现象，也承认社会学研究必须包含价值关怀。然而，他始终没有正面应对这些特殊性可能对实证方法构成的结构性限制，只是在原则上宣称这些困难可以克服。

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诠释学鸿沟。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会有意识地赋予自身行动以意义，而社会行动恰恰是意向性的、意义荷载的。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之处，在于它们始终已经被行动者的解释所渗透。把社会现象当作“物”来研究，固然在发展社会统计、制度分析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一旦涉及规范、价值、集体记忆、政治话语等深层结构，纯粹的外部观察就无法抵达其核心。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都是在这一点上与孔德传统分道扬镳的。

此外，孔德的方法论还面临倒因为果的风险。他用来描述社会整体结构的许多概念，如家庭、分工、宗教、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纯粹的经验发现，而是从一种关于“秩序社会应当是怎样的”先行直观中建构出来的。表面上是经验描述，底下运作的是规范性的整合想象。这种现象在后来的功能主义传统中一再重现，早已成为批评者攻击的靶心。

### (三) 实证主义与人道教：内在逻辑的必然延伸还是理论转折？

孔德思想中最令后世困惑的，莫过于晚年“人道教”的创立。许多人将其视为实证主义的自我背叛——一个声称要根除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思想家，最终却建立了一种以人类为崇拜对象的类宗教。然而，将这一转变简单解释为“断裂”“晚年癫狂”或“反常”，恰恰遮蔽了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深入考察孔德思想的整体脉络会发现，人道教并非实证主义的意外产物，而是其伦理驱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伸。

首先，从孔德的知识规划来看，他自始至终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论者。实证主义对孔德而言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方法，更是重建社会秩序的工具。他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已经明确指出，实证阶段的到来意味着社会不再需要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sup>[4]</sup>，但这并未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个体以何为意义依托？科学提供了“如何”的知识，却无法直接回答“为何而活”的价值问题。在拒绝了传统宗教之后，孔德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同时为社会整合提供情感基础的东西。人道教正是这一功能空缺的填补者。

其次，孔德的“人道”概念有其思想史渊源。他深受圣西门“新基督教”理念的影响，后者试图在启蒙理性与基督教伦理之间建立一种综合。孔德将这一构想极端化：他以“人类”(Grand être)取代上帝，将实证主义的伦理维度制度化、仪式化。从这个角度看，人道教不是对实证主义的背叛，而是实证主义在其社会面向上的自我完成——一种试图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道德统一性的激进尝试。孔德设计的历法、圣徒名录、教义问答等，表面上看是宗教模仿，实质上是在将实证主义的精神具身化为一种可操作的社会制度。

然而，这一尝试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孔德用以反对神学的核心论据是经验的可验证性，而人道教的核心命题——“人类是值得崇拜的最高存在”——恰恰无法被经验直接验证。他批评形而上学使用无法证实的抽象实体，却自己创造了一个同样难以操作的集体概念。这种张力不是孔德个人的思维失误，而是任何试图以纯科学为基础建立整全性世界观所可能遭遇的根本困境：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世界如何运作，却无法独自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孔德的“人道教”以一种笨拙而真诚的方式暴露了实证主义的边界——它既是实证主义逻辑推至极致的产物，也反过来揭示了实证主义在价值领域的内在局限。

理解这一复杂性，有助于避免对孔德的简单化评判。无论是将人道教视为可笑的怪诞，还是将其视为实证主义的必然归宿，都忽略了其中深刻的理论挣扎。更恰当的看法是：人道教展示了实证主义在尝试回答“应当如何”时不得不借助某种超越纯粹经验的形式，这一洞见对于后来韦伯的“价值中立”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乃至当代关于科学与价值关系的讨论，都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 5. 结语：孔德思想的遗产、限度与当代回响

### (一) 理论贡献与内在矛盾

孔德的理论遗产是多层次的。在学科层面，他赋予了社会学独立的名称与合法的学术身份，为这一学科从哲学母体中脱胎而出提供了科学的徽章。在理论层面，他对工业文明的社会病理做出了相当系统的早期诊断——失范、专业化导致的分裂、个体主义的膨胀，这些问题至今未退场。在方法论层面，他为社会研究的系统化与经验化提供了最初的纲领与术语。在社会哲学层面，他关于社会整体不可还原为个体之和、社会整合需要精神纽带的命题，构成了一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持续反思。

然而，这些贡献与深刻的内在矛盾共存。他的决定论倾向削弱了人类行动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受到马克思、韦伯等人从不同立场的批评。其晚年“人道教”的构想，证明反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在其极限处，完全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形而上学——以一种去神话化的方式重新神话化。这些局限并非孔德个人的思想失误，而是实证主义范式本身的系统性问题在初始阶段就已经暴露出来的症状。

### (二) 数字社会语境下孔德思想的重新激活

在 21 世纪，数字技术正在深刻而微妙地重写社会联结的规则。社交网络创造出跨越时空的公共空间，也让情感传播、意见极化、信任崩塌成为常态。平台化的资本主义催生出新的劳动方式与剥削机制，国家与资本对个体数据的无限获取，使权力运作的方式愈发隐蔽。站在此时此地重访孔德，也许可以提出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一，算法治理能否成为孔德意义上的“新实证精神”的执行者？孔德梦想的是科学精英依据客观规律对社会做出理性引导。在今天，数据驱动的算法治理似乎以一种技术化的方式部分地实现了这一梦想——不过，引导社会的决策者不再是哲学家，而是代码与机器学习模型。以期间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码”为例，这一技术系统通过实时识别个体健康状态，在复工复产与隔离防疫之间寻求平衡，为分布式的社会决策提供了一致的依据。张权、黄璜在《政治学研究》的分析中明确指出，健康码实现了数字技术对既有国家认证体系的嵌入，使对治理复杂性的高度化约得以跳出“控制”与“自治”的对立逻辑<sup>[8]</sup>。然而，“码治理”并非没有风险。法学界已经注意到，从“健康码”到“文明码”，数据治理发生了“滑坡效应”——数字化的公权力在其天然扩张性的驱使下不断外溢。健康码对个体进行全方位监控，处理大量涉及隐私的敏感个人信息，以限缩个人权益为对价换取风险管控能力的提升。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欧盟。2024 年 8 月 1 日，全球首部综合性人工智能监管法规《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侧重建立基于风险的监管框架，涵盖数据透明与算法问责等核心规则<sup>[9]</sup>。这一立法实践可视为从孔德式“科学精英主导”向“制度化的民主问责”的重要转型。然而，监管能否真正穿透算法黑箱仍是未知数<sup>[10]</sup>。当伦理判断被还原为参数优化，当公民在治理中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数据点，“为预见而求知”的技术版本便暴露出价值中立外表下的潜在风险。孔德的实证精神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同时却以“人道”为最高价值依托，这一点与纯粹技术化的算法治理构成了一种张力：科学的预见与行动，应以何种伦理为准绳？答案不能只是“更精准的模型”，而必须在制度设计中纳入对公共价值的持续追问。

其二，“秩序与进步”的命题在当代价值分裂中再次浮现。孔德要求二者统一于一个有机的进化过程，而当代世界展示的更多是二者之间的断裂。有研究进一步揭示，内容与用户兴趣的匹配在最初 200 个视频的观看中就迅速发生，随着兴趣对齐内容被不断放大，接触新标签的多样性急剧下降。算法不仅放大了特定的政治叙事，也加速了个体认知空间的窄化。孔德的命题在此转化为一种警示：失去了对“进步何以不瓦解秩序”的严肃思考，社会整合将在剧烈的断裂中走向难以修复的局面。

其三，数字时代的“新社会静力学”是否可能？互联网构建了高度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按孔德的有机体论，这种连接本身就蕴含着整合的可能。然而实际经验却表明，连接并不等于团结，互动可能强化偏见而非消解分歧。以 Reddit 为例，一项发表于 2024 年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那些汇聚了相同意识

形态和政治倾向用户的子版块中,不文明言论的比例显著更高,极化与敌对情绪更容易被触发。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信息乌托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问题:当个体只接触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时,不仅会变得更加极端,而且会丧失对多元事实的共同认知基础[11]。

与此同时,网络社会的运行也在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印证孔德的另一洞见:社会整合需要精神纽带。在社交媒体的共同经验基础被算法推送不断削弱的条件下,一种新的整合形式也在萌生。有研究者提出了“泛在团结”的概念,描述数字互动与计算能量如何重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结关系,具体表现为实体社区向虚拟社区的迁移、工业劳动分工向数智劳动分工的转化等。今天的数字社会不是没有整合,而是整合的形态从孔德所设想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整合框架,裂变为多元且互不相通的圈层共同体。数字社会的整合危机于是逼迫我们重新思考:在缺乏单一整合中心的条件下,复杂社会究竟依靠什么来维持最低限度的共同性?答案很可能不在于重返某种统一的整合框架,而在于构建容纳差异的元共识机制——一个能够协调不同价值立场的、更具包容性的沟通架构。

### (三) 超越孔德:从实证精神到后实证主义对话

孔德的实证哲学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科学的宣言。它相信世界的可理解性,相信科学方法的普适性,相信知识积累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线性关系。20世纪中叶以来,后实证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科技哲学的相关研究系统性地拆解了这种信念的不少基础。观察的理论负载、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建构,都使“客观的社会规律”这一措辞变得需要更加审慎地使用。

然而,后实证主义拆解的不是科学的合法性本身,而是一种关于科学的朴素神话。同样,批判孔德的自然主义预设,不等于抛弃实证研究的精神。恰恰相反,当代社会科学的演进呈现出一种辩证的面貌:一方面在方法论上更加自觉地承认诠释与因果解释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又在经验研究的精度与广度上不断取得突破。从这一角度看,孔德的遗产并非一条方法论上的死胡同,而是一个被持续回访的理论起点。每一次对孔德的批判,都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科学知识与社会世界之关系的理解。

归根到底,孔德提出的是一个问題,而不是一个答案。这个问題是:现代性条件下,一个分化且复杂的社会如何可能既保持秩序,又持续进步?他给出的实证主义答案有其历史局限,但这个问題的分量并未减轻。今天,当我们面对气候危机、技术垄断、全球性传染风险、价值观上的深刻分裂时,一个以理性审视为核心的学术传统仍然值得继承——不过,它必须比孔德所设想的更谦逊,更能容纳不确定性与多元价值,更能够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打开空间。这种对话,也许是孔德实证主义精神在当代最具生命力的转化形态。

## 参考文献

- [1] [法]奥古斯特·孔德. 积极哲学[M]. 哈丽特·马蒂诺, 编译. 伦敦: 约翰·奇普曼, 1853.
- [2] Pickering, M. (1993) Auguste Com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27975>
- [3] [法]昂惹勒·克勒默-马里埃蒂. 实证主义[M]. 管震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4] [法]奥古斯特·孔德. 实证哲学[M]. 哈丽特·马蒂诺, 编译. 伦敦: 约翰·查普曼, 1853.
- [5] Comte, A. (1875)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Vol. 2. Longmans, Green.
- [6] Durkheim, E.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Swain, J.W., Trans., George Allen & Unwin.
- [7] [法]奥古斯特·孔德. 论实证精神[M]. 陆治, 导读注释.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 [8] 张权, 黄璜. 技术赋能与复杂性化约——基于“健康码”的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22(2): 115-126.
- [9]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 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 2024年6月13日关于人工智能统一规则的(欧盟)第2024/1689号条例(人工智能法案) [EB/OL].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2024/1689/oj>, 2024-08-01.
- [10] Pasquale, F. (2015) The Black Box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4159/harvard.9780674736061>
- [11] Sunstein, C.R. (2007) Republic.Com 2.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